

援儒革道，叶落归根

——金代医家张从正道医思想辨析

程雅君

张从正及其《儒门事亲》的医学哲学思想，长期以来学者将之定位“儒医”。对于其中的“道医”部分，中医学界几乎视之糟粕，道教学界无人涉及。作为医学改革家的张从正，其对医学的改革突出体现在援儒革道上。张从正学术源于道医，而不是儒医。

关键词：张从正 《儒门事亲》 道医 儒医 学术渊源

作者程雅君，1972年生，医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张从正（约1156—1228年），字子和。金睢州考城人。春秋时睢州为戴国，故而又自号戴人。因长期在宛丘行医，又有人称他为“张宛丘”。《金史》本传云：

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张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二法》之目存于世云。^①

作为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张从正，是“攻邪派”的开山祖师，其学术渊源，本与道医学有着血脉联系。但现代关于张从正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医学界将其学术思想的“道医”部分视为糟粕；道教学界可能由于其代表作《儒门事亲》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忽略了张从正学术思想的“道医”部分；^②。其实，作为医学改革家的张从正，其对医学的改革突出体现在援儒革道上，他是中医学从道医向儒医转化阶段的典型和关键人物。本文在全面考察张从正的生平、著述、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阐释张从正的道医思想。

近代以来的学者，将张从正的学术思想归为儒医，应该说不乏依据的。首先，也

^① 元·托克托等修《金史·张从正传》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六十九“方伎”。

^② 作者按：中医学界有关于中医文化方面的专门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中医学与儒、释、道的关系。此亦是医学与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如果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医家或者医学思想，则视为儒医。如果是以道家道教文化为主流的医家或者医学思想，则视为道医。

是最为直接的线索就是他传世的最大医著《儒门事亲》。该书今传十五卷，其命名，《儒门事亲原序》介绍得颇为清楚：

是书也，戴人张子和专为事亲者著。论议渊微，调摄有法，其术与东垣丹溪并传。名书之义，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裹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予幼失怙，慈亲在堂，踰七望八，滫髓既具，未尝不防以药物。每虑当有所馈，委之时医，恐为尽道之累。将欲遍阅方书，诸家著述繁杂，窃为是皇皇者数载矣。近得是书，如获宝璐。执是以证，何虑臆说之能惑？惜其板久失，传本多亥豕之讹，因付儒医闻忠，较订铍梓。与世之事亲者共云。嘉靖辛丑三月戊子复元道人邵辅序。^①

据此，则张从正命名书之意，无非是以医家原理，须待儒家哲理而发明；医家价值，最在侍奉双亲之孝道。所以称“儒门”，称“事亲”，皆因他努力以儒生定为自己之故。所以学者多视之为儒医。其次，张从正在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金代，欣然因太医宜企贤和曹大使的推荐，而应聘太医院。虽然不久他因为种种原因而辞去这个职务，但是从他晚年的诗作中，仍不难看出其中的眷恋之情。《全金诗》存其《隐亭》诗三首云：

学剑攻书两不成，年来踪迹愈如萍；而今隐水无鱼钓，收拾纶竿海上行。

酷嗜医经五十年，野芹曾献紫宸前；而今憔悴西山下，更比文章不值钱。

齿豁头童六十三，迩来衰病百无堪；旧游马上行人老，不似当初过汝南。^②

学剑功书、野芹献宸，本为鱼钓功名。但是前途无望的情况下，也只有收拾纶竿，憔悴无堪，放迹江湖了。关于张从正辞去太医的原因，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时人李夷的《赠国医张子和》诗亦颇有暗示：

禁御喧喧以字行，龕工往往笑狂生。天将借手开金匱，云本无心到玉京。歌啸

动成千日醉，留连翻厌五侯鯖。祝君莫触曹瞒怒，世上青黏要指名。^③

李夷字子迁，后改名弼，宛丘人。与张从正显有交情，故叙情可信。张从正显然不是因厌倦功名而甘心离开的，而是由于触怒了某些权贵。所以他晚年的心态，对于依儒不成，才如此的惋惜。最后，也是更为大量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证明，张从正的确是努力尝试做一个儒医。《儒门事亲》卷一对“方有七，剂有十”的传统说法进行辨析云：

方有七，剂有十，旧矣。虽有说者，辨其名而已。敢申昔人已翔之意，而为之订。夫方者，犹方术之谓也。易曰：“方以类聚。”是药之为方，类聚之义也。或曰：“方谓五方也。”其用药也，各据其方。

乍一看，以“方术”来解释这个“方”字，似乎有着浓郁的道教色彩。然具体谈到这个“方术”的时候，张从正的解釋則是：

如东方濒海鹵，斥而为痼瘍；西方陵居华，食而多顛腫贅癰；南方瘴雾卑湿，而多痺疢；北方乳食，而多藏寒满病；中州食杂，而多九疸、食癆、中满、留饮、

^① 明·邵辅《儒门事亲原序》，《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御选金诗》卷二十二“七言绝句四”，《钦定四库全书》总集类。

^③ 《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三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总集类。

吐酸、腹胀之病。盖中州之地，土之象也，故脾胃之病最多。其食味、居处、情性、寿夭，兼四方而有之。其用药也，亦杂诸方而疗之。如东方之藻蒂，南方之丁木，西方之姜附，北方之参苓，中州之麻黄、远志，莫不辐凑而参尚。故方不七，不足以尽方之变；剂不十，不足以尽剂之用。剂者，和也；方者，合也。故方如瓦之合，剂犹羹之和也。方不对病，则非方剂不蠲；疾则非剂也。七方者，大小、缓急、奇偶，复也。十剂者，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也。^①

则所谓“方术”，变成了因地制宜的“地方方剂”的代名词。张从正不可能不知道“方术”一词的道教色彩，然而他故作新解，其“援道革儒”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儒门事亲》卷一云：

夫疟，犹酷疟之疟也。以夏伤酷暑，而成 疟也。又有 疟，连岁不已。此肝经肥气之积也，多在左胁之下，状如覆杯。是为 疟，犹 也。久而不已，令人瘦也。内伤既以夏，伤于暑而为疟，何后世之医者，皆以脾寒治之？世医既不知邪热畜积之深为寒战，遂为寒战所惑，又不悟邪热入而后出于表，发为燥渴，遂为交争所惑。相传以姜附硫黄，平胃异，攻散交，解饮子，治之百千之中，幸其一效。执以为是，至使父子、弟兄相传。及其疟之甚者，则归之祟怪，岂可不大笑耶？《内经》：“归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难化也？……会陈下有病疟二年不愈者，止服温热之剂，渐至衰羸。命予药之余，见其羸，亦不敢便投寒凉之剂。乃取《内经》“刺疟论”详之曰：“诸疟不已，刺十指间出血。”正当发时，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热立止。咸骇其神。余非衒术，窃见 学之人，不考语典，谬说鬼疾，妄求符篆，祈祷辟匿，法外旁寻，以致病人迁延危殆。疟病除岚瘴一、二发必死，其余五脏六腑，疟皆不死。如有死者，皆方士误杀之也。^②

以医理解病原，以谬误拨迷信，引经据典，力破愚昧鬼神之说。又以临床实例来明确批判那些“谬说鬼疾，妄求符篆，祈祷辟匿，法外旁寻”的晚学、方士之流。此中我们不难见出，关于“方术”做过新解之后，对于道教原来属于方术的那一套，他变换的改称为“方士的活动”。如此，一旦有了相关案例可以帮助自己发挥这种思想的时候，张从正也似乎总是力图朝着一种实证科学的路子来驳斥巫觋符咒之类的活动。《续名医类案》卷二十九：

张子和曰：“予昔过夏邑西，有妇人病胀如鼓。饮食乍进乍退，寒热更作，而时呕吐，且三年矣。师巫觋符咒，无所不至，惟俟一死。会十月农隙，田夫聚猎。一犬役死磔于大树根盘，遗腥在其上。病妇偶至树根，顿觉昏愤眩瞀不知人，枕于根侧。口中虫出，其状如蛇，口眼皆具，以舌舔其遗腥。其人惊见长虫，两袖裹其手，按虫头极力出之，且二尺许，重几斤。剖而视之，以示诸人，其妇遂愈。虫亦无名。此正与华元化治法同，盖偶得吐法耳。^③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一“七方十剂绳墨订一”，《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一“疟非脾寒及鬼神辨四”，《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③ 清·魏之琇撰《续名医类案》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张从正的非道医身份似乎比较清楚了。《儒门事亲》卷七“腰胯痛九十三”更记载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案例：一男子六十余，病腰、尻、脊、胯。皆病数载不愈，昼静夜躁，大痛往来，屡求自尽天年。且夕则痛作，必令人以手槌击，至五更鸡鸣，则渐减，向曙，则痛止。左右及病者，皆作鬼神、阴谴、白虎啮，朝祷暮祝。覩巫、僧道、禁师至，则其痛以减。又梦鬼神战鬪相击。山川神庙，无不祭者。淹延岁月，肉瘦皮枯，饮食减少，暴怒日增，惟候一死。这时：

有书生曰：“既云鬼神、虎啮、阴谴之祸，如此祷祈，何无一应？闻陈郡有张戴人，精于医，可以问其鬼神、白虎与病乎？彼若术穷，可以委命。”其家从之。戴人诊其两手，脉皆沉滞坚劲，力如张。谓之曰：“病虽瘦，难于食。然腰、尻、脊、胯皆痛者，必大便坚燥。”其左右曰：“有五、七日，或八、九日，见燥粪一两块，如弹丸，结硬不可言。曾令人剝取之，僵下一两块，浑身燥痒，皮肤皱揭，枯涩如麸片。”戴人既得病之虚实，随用大承气汤，以姜枣煎之，加牵牛头末二钱，不敢言是泻剂。盖病者闻暖则悦，闻寒则惧。说补则从，说泻则逆，此弊非一日也。而况一齐人而傅之，众楚人咻之乎？及煎成，使稍热咽之，从少至多，累至三日。天且晚，脏腑下泄四、五行，约半盆。以灯视之，皆燥粪燥屎块，及瘀血杂脏，秽不可近。须臾痛减九分，昏睡，鼻息调如常人。睡至明日，将夕始觉饥，而索粥。温凉与之，又困睡。一、二日，其痛尽去。次令饮食调养，日服导饮丸、甘露散、滑利便溺之药，四十余日乃复。^①

此案例通过一个饱受腰、尻、脊、胯病痛的病人，在经过种种不可言传的折磨中，以至于左右及病者，皆作鬼神作祟的情况下，由一个“书生”，也就是“儒生”来指点迷津，最后在张从正的几乎完全是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②式“儒医”式的治疗中，大病痊愈。张氏此段案例，几乎是旗帜鲜明地把自己放在“儒医”的方向上，对各种“覩巫、僧道、禁师”的“鬼神、阴谴、白虎啮”的说法进行批判。故而，从诸如此类的线索中，张从正不惟自己有意识的努力向儒医靠拢，并且在医学实践和以学理论上给与有力的推行和鼓吹。所以清·陆陇其《读<金史·方伎传>》感慨云：

噫！治天下而用法，必若张子和，然后可哉？又《金史》云：“五谷有恒性，而顺成不可必，故有年大。有年以异，书于圣人之经，犹人有恒性，而至行不易得，故孝友以异传于列代之史。若治天下者，能如张子和之用药，亦何患？孝友之风，不满天下哉？”^③

本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近代以来的学者之所以将之归为儒医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并不总是和他的初衷相吻合。我们考察张从正医学思想的根源，还要仔细辨析其中诸多的复杂因子。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七“燥形”，《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孔子著，魏·何晏集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第七”音义，《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③ 清·陆陇其撰《三鱼堂文集》卷四“杂著”，《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二

张从正复杂的医学理念，首先表现在大量的与他本人标榜和努力的“儒医”方向显著矛盾的大量案例上。《儒门事亲》卷七“咽中刺塞一百十”云：

戴人过隐阳，强家一小儿，约五、六岁。同队小儿以蜀黍秸相击，逆芒倒刺于咽中，数日不下粥、药，肿大。发其家，告戴人。戴人命取水，依道经中“咒水法”，以左手屈中指及无名指，作三山印，坐水盂于其上。右手掐印文，是金创印。脚踏丁字，立望太阳或灯火，取气一口，吹在净水盂中。咒曰：“吾取老君东流顺，老君奉 摄去毒水。吾托大帝尊，所到称吾者，各各现帝身，急急如律令。”摄念七遍，吹在盂中，虚搅卓三次为定。其儿咽水下咽，曰：“我可也。”三、五日肿散，乃知法亦有不可侮者。^①

“依道经中‘咒水法’”，此明白无误的表明了张从正“道医”的实践特征。所谓“法亦有不可侮者”，其“法”，道医之法，与“儒医”无干。

事实说明，当某种疾病于医药处无法处置之时，张从正不仅信奉道医、而且专心求各种咒法、存思法等典型的道医术。《儒门事亲》卷五“金疮五十四”：

夫一切刀箭所伤，有刀箭药。用风化石灰一斤，龙骨四两，二味为细末。先于端四日采下刺蓊菜，于端午日五更，合杵臼内，捣和得所团，作饼子若酒曲。中心穿眼，悬于背阴处阴干，捣罗为细末，于疮口上掺贴，亦治里外赚，并诸疮肿，大效。又有咒法。咒曰：“今日不祥，正被某伤。一禁不疼，二禁不痛，三禁不脓、不作血，急急如律令，奉 摄。”又每念一遍，以右手收一遍，收在左手中。如此七遍，则放手吹去。却望太阳取气一口，吹在所伤处。如阴晦夜间，望北斗取气亦得。所伤之人，大忌鸡、猪、鱼、兔、酒、醋、热面、动风之物。如食之，则疮必发。又一法：想东方日出始，取气一口；日出一半，取气一口；日大圆满，取气一口。吹在所伤之处，如此三次，则止。用法之人，并无所忌。所伤之人，禁忌同前。可于无药之处用之。^②

又如同卷“身瘦肌热八十五”云小儿身瘦、肌热、面黄、腹大或吐泻，腹有青筋、两胁结硬，如椀之状，名“乳痈癖”，俗呼曰“妳脾”。关于这个症状，张从正先从病理上分析之：

乳痈得之，绵帛大厚，乳食伤多，大热则病生肌，大饱则必伤于肠胃。生于肌表者，赤眼、丹瘤、疥癣、痈疖、眉炼、赤白、口疮、牙疳、宣烂及寒热往来。此乳母抱不下怀，积热薰蒸之故，手脉浮数也。伤于肠胃者，吐泻、惊疳、哽气、腹胀、肌瘦、面黄、肚大、筋直、喜食泥土、揉鼻窍、头发作稂、乳瓣不化，此皆大饱之致然也。久而不愈，则成乳痈，两手脉沉而紧也，此其辨也。已上诸证，皆乳母怀抱，奉养过度之罪癖之疾。”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七“燥形”，《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五“金疮五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然后提出治疗方案：“可以丁香化癰散取过，数服牛黄通膈丸、甘露散、益黄散等药磨之。然而谈到如果不能治愈的时候，可以有揉脾一法。此法又是道教医术：

咒曰：“日精月华，助吾手法。 斩减消，驱毒 掇。”右用法之人，每念一遍，望日取气一口，吹在手心，自揉之。如小儿病，在左壁上，用法之人亦左手揉之；在右壁，以右手揉之。亦吹在乳脾上，令母揉之。男孩儿用单日，女孩儿用双日。大忌风雨、阴晦、产妇、孝子见之。用法之时，宜于日中前。晴明好日，色则可矣。

可见，在正常疗治不能取得效果的情况下，张从正并没有固守“儒医”的身份，而是非常用心的采用道医术。他如同卷“疮疖瘤肿五十一”、“疮肿丹毒五十二”亦此类：

夫大人疮疖、小儿赤瘤肿发之时，疼痛不止。《内经》曰：“夫诸痛痒、疮疡，皆生于心火。”可用一咒法禁之，法者是心法。咒曰：“龙鬼流兮诸毒肿，痛疮脓血甚被痛。忘心称念大悲咒，三唾毒肿随手消。”右一气念咒三遍，望日月灯火取气一口，吹在疮肿丹瘤之上。右手在疮上虚收、虚撮三次，左手不动。每一气念三遍，虚收、虚撮三次。百无禁忌。如用之时，心正为是。此法得于祖母韩氏相传，一百余年。用之救人，百发百中。若不食荤酒之人，其法更灵。病疮肿者，大忌鸡、猪、鱼、 发热、动风之物。此法不得轻侮，无药处可用之。

夫大人、小儿疮肿，丹毒发热、疼痛不止者，有一法。面北端想北海雪浪滔天、冰山无际、大寒严冷之气。取此气一口，吹在疮肿处，立止。用法之人，大忌五辛之菜、五厌之肉。所病之人，切忌鸡、猪、鱼、兔、酒、醋、湿面等物，无药之处，可用此法救之。

不唯如此，在因为外物生病，不能一气脉理论圆通解释的情况下，张从正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道藏经》一咒法”。《儒门事亲》同卷“鱼刺麦芒五十六”又载：

夫鱼刺、麦芒、一切竹木签刺咽喉，及须发惹伴在咽嗑中，不能下者，《内经》曰：“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可用《道藏经》一咒法治之。咒曰：“吾请老君东流顺，老君奉勅掇掇法毒水。吾托大帝尊，不（按，原文作此，当“所”字之误。）到称吾者，各各现帝身，急急如律令。奉敕掇。”一气念遍，又以左手屈中指、无名指作三山印，印上坐净水一盞，右手掐印文，作金创印。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左手象地，右手象天，虚挽虚卓，九次为定。左足横，右足竖，作丁字立。如作法时，望日月灯火，取气一口，吹在盞内。此法百无禁忌。用法之时，以正神气是也。如所伤物下，不可便与米汤、米饭吃，恐米粒误入疮口中，溃作脓也。姑以拌面 养之数日，可也。

他如《儒门事亲》同卷“禁蝎五十九”载：

夫禁蝎有一咒法，咒曰：玉女传仙掇，敕斩蚘蜥灭。 右如有蝎螫之人来求治者，于蝎螫处望而取气一口，默念七遍，怒著作法，吹在蝎螫处。《内经》曰：蜂蛰之毒，皆属于火。可用新水一盆浸之，如浸不得处，速以手帛蘸水搭之，则痛止也。用法之人，大忌五厌肉。

以及同卷“疟疾不愈九十七”载：

夫疟疾连岁不愈者，可用咒果法治之。果者，谓桃、杏、枣、梨、栗是也。咒曰：吾从东南来，路逢一池水。水里一条龙，九头十八尾。问伊食甚的，只吃疟病鬼。’右念一遍，吹在果子上。念七遍，吹七遍在上。令病人于五更鸡犬不闻时，面东而立，食讫，于净室中安卧。忌食瓜、果、荤肉、热物。此法十治八九。无药处，可以救人。

亦此类。更有甚者，《儒门事亲》同卷“乳痈七十四”记载了张从正即使能够运用圆通的医学理论解释病因时，也会毫不犹豫选用道医术：

乳痈发痛者，亦生于心也，俗呼曰‘吹乳’是也。吹者，风也。风热结薄于乳房之间，血脉凝注，久而不散，溃腐为脓也。可用一法禁之，咒曰：谨请东方护司族，吹妳是灰妳子。右用之时，当先问病人曰：甚病？病人答曰：“吹妳”。取此气一口，但吹在两手坎字文上，用大拇指紧捏定，面北立，一气念七遍，吹在北方。如此者三遍。若作法时，以左右二妇人面病人立，于病乳上痛揉一、二百数，如此亦三次则愈。

既然已经以“风热结薄，血脉凝注”理论解释了“吹乳”之病的原理，但提供的仍然是道教医术，张从正的医学思想的复杂之处，可见一斑。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张从正运用道医符箓之术，但我们也能找到他在配制药物上，积极采取道教玄妙法术的事例。《儒门事亲》卷九，张从正记载其配制治疗出箭头一病的“万圣神应丹”的过程：

右于端午日前一日，持不语。寻见菖荅科，言道：“先生你却在这里那？”道罢，用柴灰自东南为头围了，用木楔子掘取了根周围土。次日端午，日未出时，依前，持不语，用钁口一，钁取出土。用净水洗了，不令鸡犬、妇人见，于净室中，以石臼捣为泥丸如弹子。大黄丹为衣，以纸袋封了，悬于高处阴干。如有人着箭，不能出者，用绛绢盛此药讫，放脐中，用绵裹肚，系了。先用象牙末于疮口上贴了，后用前药。如疮口生合，用刀子利开，贴之。^①

从配制药物的特殊日期选择、莫名情态话语、严格制作，神秘保存、玄虚举止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各种避讳上，张从正的方法都是完完全全道医的做派。

考察张从正的复杂医学思想，还应结合他本人的生平状况来进行。元·刘祁撰《归潜志》卷六云：

为人放诞，无威仪，颇读书，作诗，嗜酒。久居陈，游余先子门，后召入太医院，旋告去，隐然名重东州。麻知几九畴与之善，使子和论说其术，因为文之，有《六门三法》之目将行于世。会子和、知几相继死，迄今其书存焉。^②

张从正虽有心向儒，但从他的行为举止来看，所谓放诞，所谓无威仪，均非儒家克己复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九“杂记九门”，“万圣神应丹出箭头”，“菖荅科”（按原注：一名天仙子，取着中一科，根本枝叶，花实全者好。）《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元·刘祁撰《归潜志》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礼之教。而张从正这种处世态度,以及他浓厚的道医色彩,应该与他所接受的浓郁的道医影响有关。张从正应该说至少算是刘完素的私淑弟子^①,而刘完素无论是从医学理论还是从医学实践上而言,都堪称道医之大、之纯正者。《儒门事亲》卷十三张从正在其《刘河间先生“三消论”》一文中首论:“《易》言天地自太虚至黄泉有六位,《内经》言人之身自头至足亦有六位,今余又言人胸腹之间自肺至肾又有六位。人与天地、造化、五行同一炉鞴,知彼则知此矣。”^②这种“人与天地、造化、五行同一炉鞴”思想,注定了张从正在学术思想上对刘完素道医思想上的继承。所以,尽管张从正在自己的医学思想和从医实践中努力走出一个新的方向,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但对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医生而言,一旦道医的某些医术真的能为医学实践所证明的时候,他也会坦然的打通思想的樊篱,在追求实践的过程中保持真诚地对真知的承认。张从正的大弟子,《儒门事亲》的整理和润色者麻知几同样是一个道医思想比较典型者。从麻知几早年的求仕经历和学术思想的儒家倾向来看,颇类张从正。而且此人亦“性资野逸,高蹇自便,与人交,一语不相入,则迺去不返顾。自度终不能与世合,顷之,复谢病去。”^③性格亦类张氏。更加后来他因经义学《易》,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筮、射覆之术。及至晚年喜爱医术,遂得以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且为润色其所著书。^④至此,他身上的道医色彩益发鲜明了。所以元·刘祁《归潜志》卷二云:“知几为人耿介清苦,虽居贫,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狭,交游少不惬意辄怒去。盖处士之刚者也。”^⑤称其“以道自守”,称其“处士之刚者”,俨然以道人目之了。张从正的这些师承渊源和传递脉络,也能旁证出他的道医思想和道医法术的非偶然性。

^① 作者按:金元明清以来,皆以张从正为刘完素之弟子。但现代学者或有异议者,如冯志广、杨建宇等在《张子和学术思想渊源》论文中认为:“张氏大量地、比较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扁鹊、华佗流派的诸多学术观点。张氏的学术观点与扁鹊《难经》的学术观点一脉相承,继承了儒学、《内经》、《伤寒论》、河间学派的部分学术观点,并提出了自己创新的观点。同时,张子和(从正)学术思想是对《内经》相关理论之扬弃,而渊源于扁鹊《难经》学派。”笔者认为张从正应该说至少算是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根据是:一、《金史》本传云:“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二、元·戴良《赠医士周原启序》云:“金源有国,时医者三人,曰刘守真氏、曰张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守真、子和当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风气坚劲,而禀受雄浑;饮食充厚,而保养慎密。故其治疾也,每以大实大满视之,而用泻法,以攻其有余。”(元·戴良撰《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鄞游稟第七·序”,《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清·阎若璩《跋素问》云:“刘守真、张子和辈,值金人强盛,民悍气刚,故多用宣泄之法。”(清·阎若璩撰《潜邱札记》卷五“补正日知录”,《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述两位学者都把刘完素、张从正的学术思想合为一体,认为刘、张二人“多用宣泄之法”,“每以大实大满视之,而用泻法,以攻其有余”,而与张洁古、李明之、朱彦修、滑伯仁等比较。可见,张从正学术思想受刘完素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②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③ 元·托克托等修《金史·张从正传》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六十四“文艺下”。

^④ 元·托克托等修《金史·张从正传》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六十四“文艺下”。

^⑤ 元·刘祁撰《归潜志》卷二,《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三

事实上，考张从正之所以被定为儒医的原因，首先在于《儒门事亲》的命名上。据明·邵辅《儒门事亲原序》介绍，是张子和专为事亲者著。但其名书之义，所谓“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裹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①的说法，则并不见诸于张从正本人的叙述。而整理《儒门事亲》者，确是曾经有着同样儒医思想的麻知几。但依据金·元好问撰《真定府学教授常君墓铭》所云：“国医宛丘张子和，推明岐黄之学为说，累数十万言，求知几为之润。”^②则张从正著书立说的本意，是在于“推明岐黄之学”，亦即道家的那一套。而既求知几为润色，则偏差之处，必在所难免。有意思的是，康熙《御定渊鉴类函》卷三百二十二云：“所著有《儒门事亲》若干卷，盖为儒生桑某所润色云。”^③此说是“儒生桑某所润色”，虽不知何据，但强调的也还是一个意思。因此，《儒门事亲》从命名到加工，在经过儒生润色这一点上应该不会有错。那么，张从正被视为儒医的原因，当然也就更为复杂了。

金兴定中（1217-1221），张从正被召补太医，不久辞归，是其生平重要事件。召补太医自然与张从正医名素著相关，其直接原因可能是由于太医宜企贤和“曹大使”的推荐。《儒门事亲》卷八“伏瘕一百三十一”：

汴梁曹大使女，年既笄，病血瘕数年。太医宜企贤以破血等药治之，不愈。企贤曰：“除得陈州张戴人方愈。”一日，戴承语至汴京，曹大使乃邀戴人问焉。戴人曰：“小肠遗热于大肠，为伏瘕，故结硬如块，面黄不月。”乃用涌泄之法，数年之疾，不再旬而效，女由是得聘。企贤问谁治之，曹大使曰：张戴人。企贤立使人邀之。^④

此时张从正 60 余岁。但张从正在太医院任职时间不长，《归潜志》云：“后召入太医院，旋告去，隐然名重东州”^⑤，《河南通志》言“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辞去。”^⑥。关于张从正辞归的原因，在其同时及后世均众说纷纭，甚至谣言四起。《儒门事亲》卷九“杂记九门·谤峻药”条记载：

或言戴人用医皆峻激，乃本草中下品药也，岂可服哉？戴人曰：“甚矣，人之不读书！《本草》言上药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者，所以辨其性刚柔也。《内经》言所谓君、臣、佐使者，非本草中三品之谓也。主治之为君，次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佐使。假如大黄能治此病，则大黄为君。甘遂能治此病，则甘遂为君矣。若专以人参、黄耆治人之邪气，此庸工所以常误人命也。”李嗣荣言：“京中闲人云：

^① 明·邵辅《儒门事亲原序》，《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金·元好问撰《遗山集》卷二十四“碑铭表志碣”，《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③ 康熙《御定渊鉴类函》卷三百二十二“方术部一·方术总裁一·医二”，《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④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八“内积形”，《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⑤ 元·刘祁撰《归潜志》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⑥ 《河南通志》卷七十一“方伎”，《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戴人医杀二妇，遂辞太医之职而去。’”又有人云：“昔曾医杀颖守，私遁而去。”麻知几初闻，亦疑之。乃载见戴人于口阳，观其用药，百发百中，论议该赡，应变无穷，其所治之疾，则不三、二十年，即十年或五六年，应手辄愈。群医之领袖，无以养生。及其归也，谤言满市。皆曰戴人医杀仓使、耿四而去，时仓使以病卒，与余未尝通姓名。耿四病嗽咯血，曾问戴人。戴人曰：公病消困，不可峻攻，宜以调养。戴人已去，后而卒矣。先生乃肖李嗣荣所言，皆诬也。凡余所治之病，皆众壤之证。将危且死而治之，死则当怨于戴人。又戴人所论，按经切理，众误皆露，以是嫉之。又戴人治病，多用峻激之药，将愈未愈之间，适戴人去，群医毁之曰病为戴人攻损。急补之，遂用相反之药。如病愈，则我药可久服，攻疾之药可暂用。我方攻疾，岂欲常服哉？疾去则止。药若果欲养气，五穀、五肉、五菜非上药耶？亦安在枯草死木之根核哉？

据此，张从正先是积极入仕，供职于太医院。然而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旋又辞归。“及其归也，谤言满市”。考张从正的自辨，首先是张从正的攻邪学术思想不被当时的太医院同行接受，所谓“或言戴人用医皆峻激，乃本草中下品药也，岂可服哉？”张从正的攻邪临床实践不易被当时的上层权贵以及儒医所接受，因为他们俗尚温补而恶攻泄。其次是张从正受到京城同行的嫉妒污蔑。所谓“戴人医杀二妇”之事，不过李嗣荣托言：“京中闲人云。”无疑是空口相诬。而所谓“戴人医杀仓使、耿四”之事，诚如张从正所辨别的那样，时仓使以病卒，与其未尝通姓名。耿四病嗽咯血，曾问戴人。戴人嘱以调养。戴人已去，后而卒。亦为污蔑。倒正如张从正所总结的群医诋毁之由更为真切：

凡余所治之病，皆众壤之证。将危且死而治之，死则当怨于戴人。又戴人所论，按经切理，众误皆露，以是嫉之。又戴人治病，多用峻激之药，将愈未愈之间，适戴人去，群医毁之曰病为戴人攻损。急补之，遂用相反之药。如病愈，则我药可久服，攻疾之药可暂用。

或以难治，或以死怨、或以庸误，皆为嫉诬之口实。故张从正的同乡李夷的《赠国医张子和》诗亦颇有暗示：“禁籞喧喧以字行，龕工往往笑狂生。”“祝君莫触曹瞒怒，世上青黏要指名”。^①以莫触曹瞒怒典故，联系到张从正的生活习惯几乎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不屑曲膝迎奉，羞于“古人以医为师，故医之道行。今之人以医辟奴，故医之道废。有志之士，耻而不学。病者亦不择精粗，一槩待之。常见官医迎送长吏，马前唱喏，真可羞也。”“为人放诞无威仪，颇读书，嗜酒”等细节，则张从正的离京，可能还有触怒其他显贵的原因。

但是我们考察张从正离开京城，放弃儒医生涯的真正原因，却恐并不仅仅在于群口嫉才，或不顾细行。前引《儒门事亲》卷九“杂记九门·谤峻药”条有一句话颇值得留意：“群医之领袖，无以养生。及其归也，谤言满市。”张从正自称“群医之领袖”，并明言其所以离开的原因是“无以养生”，则所谓“及其归也，谤言满市。”不过是他“人

^①《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三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总集类。

走茶凉”的结果。那么，张从正想走仕途，想做儒医的理想，所受到的第一大挑战，倒不是什么同行相轻，而是因为在太医院里，他感觉经济收入上的巨大失望。据《金史》卷五十五 志第三十六“百官一”：

太医官，旧自从六品而下止七阶，天眷制，自从四品而下，立为十五阶：从四品上曰保宜大夫，中曰保康大夫，下曰保平大夫。正五品上曰保颐大夫，中曰保安大夫，下曰保和大夫。从五品上曰保善大夫，中曰保嘉大夫，下曰保顺大夫。正六品上曰保合大夫，下曰保冲大夫。从六品上曰保愈郎，下曰保全郎。正七品上曰成正郎，下曰成安郎。从七品上曰成顺郎，下曰成和郎。正八品上曰成愈郎，下曰成全郎。从八品上曰医全郎，下曰医正郎。

而张从正去太医院，究竟官位何品，并不清楚。但由于他只是因了太医宜企贤得推荐而赴任，又任期过短，所医皆难症，且无缘与真正的皇家接近，故而医名显然尚未达于宫廷内部。据《金史》卷五十六 志第三十七百官二云：“太医院。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判官，从八品，掌诸医药，总判院事。管勾，从九品。随科至十人设一员，以术精者充。如不至十人并至十人置。（不限资考。）正奉上太医（一百二十月升除），副奉上太医（不算月日），长行太医（不算月日），十科额五十人。”则推测张从正在太医院最多不过是一个从九品以下的，尚未及转正的随科类医职而已。《金史》卷五十八 志第三十九“百官四·百官俸给”条云：

从九品：朝官，钱粟一十贯石，麦二石，衣绢各五匹，绵三十两。外官，诸教授，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

我们以从九品的“诸教授”的待遇来推测张从正的俸禄，当不会差距太远。则“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的确太微薄了些。因为有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张从正在民间个人行医的收入情况。《儒门事亲》卷九“杂记九门·病人负德，愈后吝财”条记载：

南乡刀镊工卫氏病风，半身无汗，已再中矣。戴人以三法疗之，寻愈。恐其求报，乃给曰：“余夜梦一长髯人针余左耳，故愈。”巫者武媪年四十，病劳三年，羸瘦不足观。诸医技绝。适五六月间求治，愿奉白金五两。戴人治之，五六日而安。止答以白金三两。乃曰：“一道士投我一符，焚而吞之，乃痊。”如此等人，不可胜计。若病再作，何以求治？至有耻前言，而不敢复求治疗，而杀其躯者。此所以世之庸工，当正病时，以犀、珠、龙、麝、丁、沉、木、乳乘其急，而巧取之。然君子博爱贤愚，亦不当效若辈也。

巫者武媪因为痼病三年，诸医技绝，无奈找到张从正，竟然“愿奉白金五两”，我们且不说这个“愿”是否是真的自愿，但张从正至少是觉得医有所值的。及至武媪病愈之后，只封三两，而亏欠二两，而张从正尚以为少，以为病人负德。仅武媪一病，收白金三两尚嫌负德，更何况这类情况“不可胜计”呢？则足见其于个人诊所的收入之丰了。那么难怪对于太医院的微薄收入，他不放在眼里了。当然，关于张从正从医的开价上，我们尚无法得出是否是天价的结论。据其反对庸医们趁人之危，巧取豪夺，故意以犀、

珠、龙、麝、丁、沉、木、乳乘病人之急的做法，他也持以“君子博爱贤愚”之念，这也是其作为大医的医德的标记吧。

不管张从正辞去太医院职务的具体原因究竟如何，但他一生毕竟难以彻底摆脱入世显达的遗憾。所以其晚年授徒、讲学，仍念念不忘“书生”之梦。《儒门事亲》卷九“高技常孤”条云：

戴人常曰：“人言我不接众工。”戴人曰：“余岂不欲接人？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医之善，惟《素问》一经为祖，有平生不识其面者，有看其文不知其义者，此等虽日相亲欲何说？止不过求一、二药方而已矣。大凡药方，前人所以立法。病有百变，岂可执方？设于富贵之家病者，数工同治。戴人必不能从众工，众工亦不能从戴人，以此常孤。惟书生、高士、推者复来，日不离门。”戴人又曰：“我之术，止可以教书生，不能受医者。”忽授老书生。戴人问之，曰：“我是书生，岂不知书生？书生固多许可，以易慢。”（戴人）曰：“彼未尝见予治病，故有是言。若亲见予治病数十人，自反思矣。”凡谤我者，皆望风取信于群医之口也。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①

从“惟书生、高士、推者复来，日不离门”到“我之术，止可以教书生”，再到以孔子的话自勉，均表明这种无法解脱的挣扎。但是毕竟这个梦境只是过眼的烟云，理想总是与现实千差万别，所以张从正辞太医后，依然行医、授徒、并抓紧了《儒门事亲》的写作、修改、定稿工作。麻知几妻病而“使人就诸葛寺礼请戴人”^②、“戴人客邓墙寺”^③等，则反映了其晚年常访道于宫观寺庙，与宗教人士交游的事实。张从正的晚年，不得不回到社会所赋予他的道医角色中来。宋·周孚《送张子和之金陵》诗云：

转蓬相遇紫髯城，老眼昏昏喜再明。与世多违真俗债，于身无益是虚名。试将休歇偿前境，莫把文章眩后生。若相钟山有闲地，早令秋雁与传声。^④

好友的“钟山闲地”、“虚名无益”的慰劝，恰好成为他晚年思想的真实反照。张从正作为一代名医，以其卓绝的医学思想，特异的人生态度，诠释了在他那个时代，一位毕生援儒革道，最终叶落归根的医家的所有的梦想和幻灭。

（责任编辑 于光）

^①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九，《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②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六“滑泄干呕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③ 金·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卷六“沙石淋三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④ 宋·周孚撰《蠹斋铅刀编》卷二“古律诗”，《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